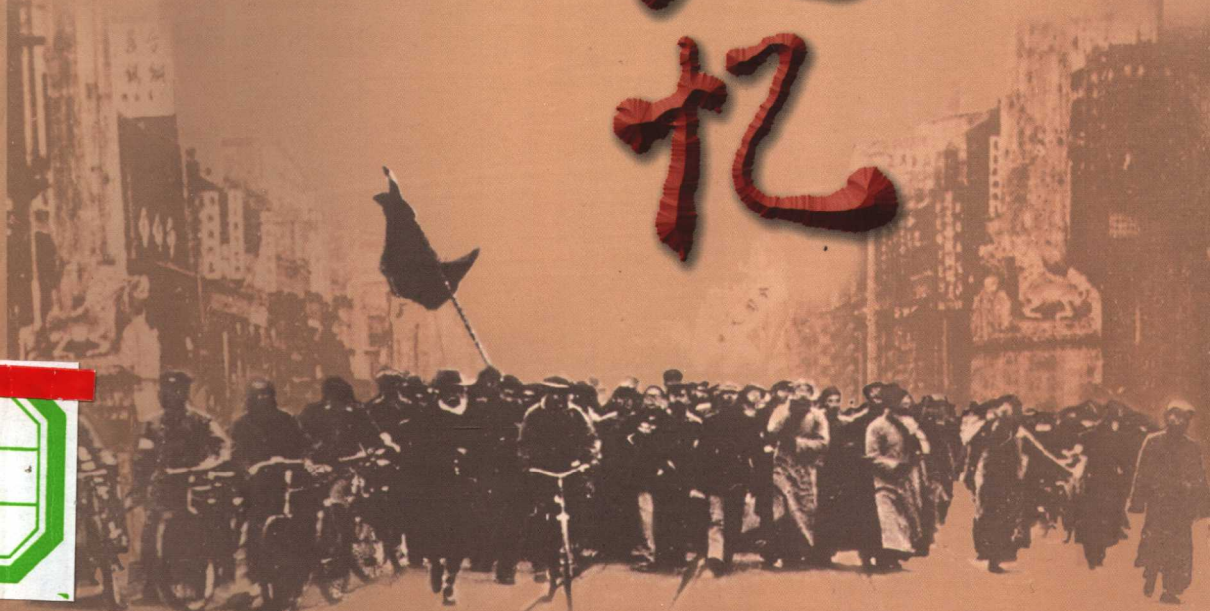


北京口述历史丛书

北京记忆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国古典名著丛书

北京记

（清）曹雪芹著

中国古典名著丛书

BEIJINGKOU SHULISHI CONGSHU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北京记忆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京记忆 /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7. 10

ISBN 978-7-5073-2421-1

I. 北… II. 中… III. 政治人物 - 生平事迹 - 中国 - 现代 IV. 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61820 号

北京记忆

编 者 /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 / 孙 翊

装帧设计 / 郭 扬

出版发行 / 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邮 编 / 100017

经 销 / 新华书店

销售热线 / 63097018

排 版 / 北京方方照排中心

印 刷 / 北京晨旭印刷厂

680×1000mm 1/16 22.5 印张 270 千字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73-2421-1 定价:48.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编者的话

人们常说：岁月消磨不了记忆。这句话作为一种感慨，作为文学艺术的语言是可以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岁月是可以消磨、尘封甚至淹没记忆的。

原因何在？不言自明。记录在纸张上的档案、资料，保护不当，会有分散和遗失。即使是刻在石版上的经文，可以躲过水淹火焚，却躲不过冰霜雨雪和风化的剥蚀。保存在人们脑中的记忆，更是随着人体机能的退化，记得的越来越少，忘却的越来越多；记得准确的越来越少，误记错记的越来越多。这是自然的辩证法，是无可更改的规律。

人类的进步，建立在一辈辈的繁衍、一代代的知识积累之上。因此，经验的归纳、教训的总结、智慧的传承是必不可少的。人们把凝聚在物质上的历史称之为“人类物质文化遗产”；把记载在纸张上（现在又有了很多新的电子保存手段）的历史称为“历史文献或档案”；更重要的，还有一部分历史，他们存在于健在的当事人头脑之中，通过他们的口，这些历史仿佛可以活生生地再现，我们把这种历史称之为：口述历史。

在历史学的发展上，口述历史曾经占有极其广阔、长久的地位。结绳系事，口述歌颂，曾经是许许多多民族曙光初现时的第一章。在现代和当代的历史中，口述历史仍然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

一下子扯远了，从研究北京历史的角度来看：

口述史是历史文献资料的重要补充，有时甚至是历史链条



中唯一的环节。如中共作为革命党的时候，为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为夺取政权所从事的活动，很多地方、很多时间是在“非法”的、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在强大敌人的压迫下，党内文件和记录被查获，会立刻引来杀身之祸。所以，那时人员的组织关系往往是单线联系，那时的行动计划和方案往往都是口耳相传，没有文字记载。即使有，很多的珍贵文字材料也都毁弃于战火之中。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党创建的过程，地下斗争的许多事迹，都来自当事人经年之后的追忆。

口述史有鲜活的特色。比较计划、总结、纲领、宣言而言，口述史可能没有那么的周全，那么的字斟句酌。但因为口述者都是亲历者，在表述过程时描绘的场景，流露出来的个人感情，会使我们有身临其境之感，拉近我们和过往历史的距离。解放战争时期，青年学生争取民主和自由的豪情，在如今已届耄耋之年的老者口中道来，依然使我们经受着那份炽热的爱国热忱。

口述史揭示着内幕。历史的发生都是在具体的地点、时间范围之内，该时该刻，亲身经历的人是有限的，要澄清历史真相，亟待当事人的回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的地下党情报工作、定都北京的经过、粉碎“四人帮”的细节、改革开放决策的制定……随便撷取几例便可知晓，没有亲历者的回忆，没有口述的记载，恐怕后人读史时，会失去了几分色彩。

口述史的记叙是一项很艰苦的工作。它至少需要两方面的努力，一是口述者，一是记录者。口述者难在要有健康的头脑和身体，要有资料的准备，要有客观的分析，要有不改事情原委的勇气。实在的说，回忆也是一桩痛苦的事，谁不是记取失败和教训比成功和欢乐更深刻呢？记录者难在采访前的准备，难在提问纲目的梳理，难在被动的等待，难在事后的整理、难在知识面的不足等等。尽管如此，几十年来，北京口述历史的工作还是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出版了民主革命时期有关的许多回忆专辑，社会主

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的口述材料也在不断地整理和披露出来。这得益于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益于人们思想观念的不断解放，也得益于录音录像等设备的使用和普及。

口述史的编写是一项很紧迫的任务。20世纪80年代，曾有一个很形象的说法，把征集口述史叫做“抢救活资料”。多亏了那时的工作，把不少涉及解放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时期、大革命时期、建党时期，甚至“五四”时期的亲见、亲历、亲闻记录下来、抢救下来。当我们刚松一口气，却又发现新中国成立时的小伙子、改革开放时期的部门领导，如今竟也七八十岁了。岁月如梭，时不我待，抢救还须继续。

由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组织编写的这套《北京口述历史丛书》，目的是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前提下，把那些曾经参与过相关历史活动的老同志、当事人、知情者的回忆口述集中起来，作为历史档案的印证、补充和参考。用确凿的事实，生动的语言、具体的感受去复述过去的那段历史，从建党到现在；去重拾那些故事，从工农商、科教文卫的发展到名人与百姓中的奇闻逸事；去抒发自己内心的感慨，不论是平淡还是激昂，不论是失败还是成功。

口述史的组织、采访、撰写、编辑、出版尚处于摸索的阶段，我们愿意踏踏实实地去做铺路者的工作，因为历史的瑰宝不能遗失，因为读者和听众在期望，因为我们历史工作者的责任和良心。

当时光又过去了几十年、上百年，当我们都已不在的时候，我们的声音还在，我们的容貌还在，我们的记录还在，更重要的是，我们讲述的历史真实还在，那是多么令人愉悦的事情呀！

让我们从现在开始吧！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2007年夏

目 录

苦 争 春

武 光 /003

北航工作的 10 年，经历了很多次思想改造、教学改革、向苏联学习、向科学进军、反右派斗争、“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贯彻“八字方针”等运动，我始终认为应该以教学、科研为中心，吸取先进经验，更要自己创新，争取超过别人。……

百 年 回 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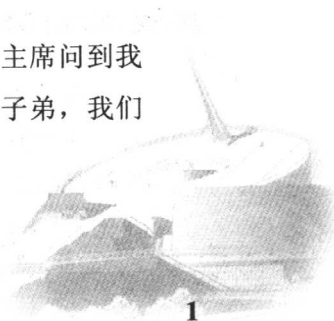
郭献瑞 /041

我们五人向毛主席写了一封不同意取消合作社的建议书，受到毛主席严厉指责：“告诉这几位同志，问问他们是共产主义者，还是合作主义者？”……

风 雨 历 程 迷 略

刘导生 /085

耀邦同志把各大区团的书记作了介绍，毛主席问到我的姓名和出生地以后，幽默地说：“你是丰沛子弟，我们有两个刘导生，只有一寸之差。”……





北京记忆 BEIJINGJIYI

党外布什维克

陈明绍 /129

周恩来说：“长江上如果出问题，那是国家影响问题，要载入党史的问题。如果不能通航，那我们这一代犯的错误就不得了。……”

政法战线老兵

刘 涌 /171

小平同志看到拣出的钢铁像豆腐渣，不由得眉头紧蹙，当场向柳州市的有关同志讲：“你们算过账没有？蚬木值多少钱，钢值多少钱，究竟哪一个上算？”……

抚今追昔忆故往

王笑一 /211

越来越多的外宾来到北京，外宾来了住宿问题很头疼，住不下就只能在大厅里过夜，有时实在没办法只能用飞机送去天津。有一次，实在是没有办法，周总理亲笔批示用专机连夜送往南京过夜。……

回忆、反思

白介夫 /251

一些返城青年经常在我家门口等着我下班回来，整天吵吵要上学。当时社会压力很大，我的思想压力也很大，办职业教育、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思想是在这种压力下逼出来的。……

忆我走过的路

王大明 /301

我从工人的语言中提出企业要搞好，首先要用“明白人”这个概念，袁宝华同志也同意这个提法，认为这个提法符合小平同志提出的干部要实现“四化”，即革命化、专业化、知识化和年轻化的思想。……



武光 1912年生于河北省深泽县，原名张青甫。1930年在北平正式参加革命，开始以革命为职业。同年加入共青团。1931年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历任北平市共青团西城区委委员、青工部长、团市委书记，中共北平市委委员。1932年任中共直中特委委员、共青团直中特委书记。1933年至1937年在北平国民党河北省第一监狱坐牢，任政治犯共产党支部书记。1938年任中共山西乡吉特委书记。1939年派往延安马列学院学习，任第三班党支部书记。1940年学习结束后留在马列学院的马列主义研究室从事研究工作。不久调任延安陕北公学干部处处长。1943年任中共平北地委副书记，后任中共平西地委组织部长。1944年任中共冀察区党委城工部部长兼敌工部部长、东工部部长。1945年任中共北平市委副书记。1947年任中共察哈尔省委组织部长。1948年任中共晋中区党委副书记。1949年5月任中共南下区党委书记。7月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长沙地委书记、长沙军分区政委。1951年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委员，粤西区党委第一书记、粤西军区政委。1954年任中共北京航空学院党委书记、院长。1963年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第一副主席。1967年1月-1978年12月，“文化大革命”中被污蔑为“刘少奇在新疆的代理人、叛徒、特务”，关进监狱和流放11年。1979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1982年任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5年离休。

老争春

武光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我在高小读书时，受到中共顺直省委特派员翟少池的革命影响，开始了秘密的革命活动。1928 年，当我 17 岁时，由小学班主任介绍我参加了刚成立的国民党深泽县党部，并任宣传部长，每月 40 块白洋。但我在小学时已接受了革命思想，故于 1930 年初，即神不知鬼不觉地秘密离开本县，踏上了北去的火车，去寻找共产党组织。在寻找党组织期间，一直受到在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工作的刘泽如的照顾。2 月，我通过原高小同学贾振丰终于找到了党的外围组织——红色革命互济会，那是我初到北平后最愉快的一天。

一、最初的北平地下革命工作

红色革命互济会是党的外围组织，任务是利用各种社会关系设法援救被捕的同志，并从经济上救济他们的家属。互济会是革命组织，因此，必须学会秘密工作，严格遵守秘密工作的



纪律，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求得生存和发展。

互济会除了营救和救济工作外，还经常做宣传和发展组织的工作。宣传工作主要是晚上秘密地在墙上用粉笔写标语，在街头撒传单；组织工作主要是发展新会员、建立新支部。

做一名洋车夫

那时候北平产业工人少，洋车夫倒有好几万，他们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受压迫最深，是一支举足轻重的革命后备力量。我党历来重视洋车夫工作。1929年10月，我党曾领导北平洋车夫举行过罢工，惨遭国民党政府的镇压，许多洋车夫被捕，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我参加互济会后，组织上决定派我去拉洋车，以此做职业掩护，开展党领导下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我被编到革命互济会宏达学院支部，有五六人，他们都是宏达的学生。支部负责人是郑雅民，热河人，共青团员，为人成熟稳重。支部成员还有董旭生，河南人，共青团员，对同志热情，斗争坚决。抗战时改名董天知，曾任山西抗日决死队第三纵队的政委，百团大战时牺牲在太行山上；刘景明，河南人，性格开朗，我们曾一同拉洋车做革命的工作，解放后他在武汉某中学做老师；小吴，江浙人，白面书生，当时他的父亲在清华大学任教。

报户口和拉洋车必须有铺保和家眷，我没有家眷，只好以北京大学学生的名义报了户口，由老洋车夫担保可以租到洋车。于是我就以假大学生和洋车夫的双重身份奔跑在北平街头。做洋车夫是很艰苦的，我的年龄小，身体又瘦弱，经常受到警察的刁难，甚至打骂，饿肚子、遭市民的白眼也是常事，但拉洋车、在洋车夫中发展组织是革命工作的需要，我不但支撑下来，而且越干越有信心。

记得我第一次上街拉客，是在西单，排成“一”字形的洋

车有好几辆，不断有顾客向前面的洋车夫讨价还价。忽然听到有顾客喊：“喂，洋车！到绒线胡同多少钱？”我抬头一看，原来是一位上了岁数的老太太。我一听绒线胡同不远，就凑上前去和老太太讲好了价钱，然后招呼老太太上车。于是我开始拉车，小心地迈开脚步，车速很慢，边走边和那老太太说话，一直把老太太送到绒线胡同下了车。

首次拉客成功，我很高兴，又返回西单，走到洋车夫们中间主动搭话闲聊。不一会儿，一个穿着蓝缎旗袍的年轻小姐走过来，她身后跟着一个胖乎乎的老妈子，手里提着大包小包刚买的东西，只见那小姐没问价钱便上了一辆新车，那老妈子也要车，她看我的车破，一定要钱少，便什么也没说就带着那一大堆东西上了我的车。

我对北平的胡同还不熟悉，又怕掉队找不到地方，暴露自己的身份，只好紧跟在小姐坐的那辆新车后，拼命加速，直奔宣武门外方向而去。这是我第一次吃力地“负重赛跑”，把我累得满身大汗，心慌腿软，几乎喘不过气来。好不容易到了终点，我已经两眼发黑，待老妈子下车后，我赶紧靠到大红门旁的石狮上，这才没摔倒。我在那里休息了一会，定了定神，这才拉车离去。

没过多久，我大体熟悉了北平城区不少胡同的名称、位置和大约里程等，有时夜间拉客，我还学会了点矿石灯，遇到天下雨我也学会了支起雨篷，我还学会了怎样均匀地使力气，遇到客人有急事，我也能飞快地跑起来。

在几个月拉洋车的实践中，我切身体验到在北平这个大都市里，洋车夫是处于社会最底层，最让人看不起，生活在饥饿线上的“自由职业”工人群体，其成份相当复杂，有破产的农民、城市贫民、失业工人、流氓无产者、退伍军人和逃兵，还有国民党派遣的特务。他们中的大多数所谓“自由”，是只有挨饿的自由，挨打受气的自由，失业的自由。他们常年累月奔



跑在北平的大街小巷里，除了交车租外，所剩无几，生活十分艰难，尤其是那些家里有老有小的洋车夫就更加悲惨了。

为了深入到那些洋车夫聚居的地方去开展工作，我曾前往西南城根太平湖地区，那里是一片低矮破旧房屋的贫民区。走到这里，就看到臭气扑鼻的垃圾堆，迎面嗡嗡乱叫的苍蝇，到处污水四溢。有一个靠墙坐着蓬头垢面的女孩和一个赤身瘦弱的男孩，他们面前放着拣煤球、拾破烂的篮子，这情景使我心里泛起一股心酸，这些可怜的幼童，好象从出生那天起就伴随他们的父母挣扎在死亡线上。

一般洋车夫住的屋子既低矮又阴暗潮湿，四面透风，冬不御寒，夏不防暑。洋车夫们的室内没有像样的家具，更没有不破的被褥和床单。

当我走进我要找的那位姓周的洋车夫屋里时，我看到房子里连做饭的炊具也没有，也不知他每天是怎么过的；屋内只有仅够一人睡觉的土炕，既无被子，又无炕席，炕头放了一块当枕头的砖头。我们进行了较长时间的恳谈，了解到该洋车夫出身贫苦家庭，他要求进步，希望多多帮助他，我也就把他当成了发展对象。

在回去的路上，我禁不住感慨万分，这些生活极端贫困的洋车夫，只要和他们交朋友，对他们宣传革命道理，进行无产阶级的革命教育，他们定能起来参加党领导的革命斗争。

我在国民党县党部当宣传部长，每月40块白洋，有名有利，有权有势，而今在马路上当牛当马，吃不饱饭，时常遭警察打骂，且有生命危险，但我是为革命，所以精神却是愉快的。

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冬春之交，郑雅民、董旭生二人介绍我加入了中

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春，我被任命为共青团西城区委员会委员、团市委的青工部长。没过多久，经王振世、董旭生介绍，由共青团员转入党，终于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1年7月，由于胡敬民（化名）的叛变，中共河北省委和团省委组织遭到破坏，马辉之（党省委书记）、王德（团省委书记）、王秋亭（团省委委员）、平杰三（党省委委员）四人同时被捕。我曾到天津请律师营救他们。此前，由于共青团北平市委书记吴正廷调上海，委员雷任民被捕，于是在河北省团省委领导下的北平共青团市委的组织也就没有了，共青团中央决定将北平共青团的城区区委和西郊区委合并，建立新的共青团北平市委，我担任团市委书记，团市委宣传委员是清华的学生胡乔木，团市委组织委员是师大的学生余志远。

我依然以拉洋车为职业掩护开展工作。有时我假装坐洋车，实际上我是在听取别的同志拉着洋车向我汇报工作和我在布置检查工作。这时，我还经常到各大、中学校参加团支部的秘密会议，晚上编写《洋车夫》、《青工之友》油印小报。共青团的组织发展比较快，北大、清华、师大等大多数大学、中学基本上都有了支部或发展了团员。

宣传工作与领导斗争

1931年初，国民党当局为不让人们知道南方苏区红军的胜利和各地工人罢工农民抗捐抗税的消息，在北平加紧实行新闻封锁，致使一些报纸不时出现“天窗”，左翼文艺书刊查禁得日益严紧，北平街头一些饭馆、澡塘、商场、影院等处，张贴着“莫谈国事”的大幅戒语，便衣特务密布城区和大学，荷枪实弹的宪兵警惕地巡逻在街头。

为了冲破敌人的封锁，宣传共产党的主张，让北平的市



北京记忆 BEIJINGJIYI

民们听到共产党的声音，红军的胜利和各地工人罢工农民斗争的消息，我和同志们一样到胡同里用粉笔写标语，用巧妙的办法撒传单。

当时我住在刘泽如家，通过刘泽如介绍认识了傅作义部队中的一名兽医官，这位兽医官有个同乡叫辛润田，辛润田的太太是一位没有文化的家庭妇女，我对她进行过教育后，她思想倾向进步，同情革命，愿意帮助我们做些事情。

那是一轮弯月的晚上，北风呼啸，天出奇地冷，趁街上行人稀少，我打扮成一个大学生的模样，辛太太帮我看风放哨，我便在德胜门内一些胡同的墙壁上，用粉笔写标语。我走在前，辛太太走在后，两人保持一定距离，当走到另一条胡同内，见四下无人时，我便掏出粉笔在墙上快速写下“打倒国民党”、“拥护红军”、“拥护共产党”、“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拥护苏联”，然后又急速转到另外的胡同。就这样在德胜门里串来串去，写来写去，辛太太一直是观察敌情放哨的合作者。别的同志写粉笔标语，大体也是这样。另外，我还在前门“劝业场”楼顶上向空中撒过传单，在东郊民巷外国使馆区，还撒过英文传单。

在斗争实践中，我深深感到，环境越严酷，斗争越紧张，越要讲究对敌斗争的策略和技术，于是我便创造了多种巧妙而有效的撒传单的方式，如塞进住户的门缝、路边的邮筒、北平图书馆和一些大中学校书报阅览室，这些地方都是撒革命传单的好地方。这些方式极巧妙，使敌人堵不胜堵，防不胜防，即使是老练的国民党特务也没办法。

我还想出一个更为巧妙的方法，即利用一些市民贪图钱财的心理，把油印好的传单叠成一个个“小包”，装在衣袋里，我边走边从衣袋里掏出“小包”扔在路上，或丢在僻静的地方，行人以为“小包”里有钱或什么别的东西，几乎每个小包都会被人捡起来，拆开一看全是宣传“打倒国民党，拥护